

宋元时期徽州宗族义庄与义庄规约研究

——以休宁下东金氏为中心

陈瑞 陶梦吟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南宋时期,休宁下东金氏以科举仕宦闻名,是典型的科举仕宦型宗族。入元后,随着科举、恩荫等政策和制度红利的消失,下东金氏急剧转型为庶民型宗族。为应对族内贫富分化严重、贫困族人日增的客观形势,南宋下东金氏官僚士大夫主动捐出俸赐设立宗族义庄,以济贫赡族、整合宗族。宋元时期,下东金氏义庄管理实行提纲—掌事—管年自上而下的科层式管理方式,在提纲之上有族长扮演义庄管理顾问和重大事务决策人的角色。为有效管理与运作义庄,下东金氏制订了义庄规约并予以多次修订。义庄规约是族规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和类型。义庄规约的制订与不断修订是下东金氏义庄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通过对下东金氏义庄规约的研究,有助于管窥宋元时期徽州乃至江南地区宗族义庄管理与运作的实态。

【关键词】宋元;徽州;宗族义庄;义庄规约;休宁下东金氏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1-0103-17

A Study on the Charitable Estate and its Regulations of Huizhou Clan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entered on Jin Clan in Xiadong of Xiuning

CHEN Rui TAO Mengyin

(Center for Hui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bstrac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Jin clan in Xiadong of Xiuning was famous for its imperial officials, and was a typical imperial official clan. After entering the Yuan Dynasty,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dividends such as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patronage, it transformed into a common people clan rapidl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of serious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poor people, the officials and literati of the cla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donate their salary to set up a clan charitable estate to support the poor and integrate the clans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management of charitable estate of the clan implemented the top-down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mode, included Tigang(提纲), Zhangshi(掌事) and Guannian(管年), in which the chief played the role of management consultant and decision-maker of major affairs. In order to manage and operate charitable estate effectively, the clan formulated the regulations and revised it many times. The charitable estate's regulations w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and type of the rules of the clan. The formulation and continuous revision of the regulations wa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收稿日期]2024-05-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徽州县域治理研究”(21BZS018)

[作者简介]陈瑞(1973—),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徽学;陶梦吟(1989—),女,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徽学。

management of the cla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regulations of Jin's charitable estate in Xiadong, it was helpful to glimpse the real state of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clan charitable estate in Huizhou and even Jiangnan area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 words: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uizhou; Clan's Charitable Estate; Regulations of Charitable Estate; Jin Clan in Xiadong of Xiuning

义庄是北宋以来出现的一种由宗族好义之士捐献土地建立的地方赈恤组织和义田“管理机构”^①。宋元时期是中国义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义庄受到学界较多关注并已取得诸多成果。学界关于宋代义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苏州范氏义庄等典型义庄的讨论,关于元代义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江南民间义庄的探讨;对于宋元时期其他地域义庄的研究则较少予以关注,即使偶有涉及,也多语焉未详、未作深论^②。截至目前,学界对宋元徽州地区的宗族义庄极少关注,至今未见专论^③。本文以休宁下东金氏为中心,综合利用正史、方志、名族志、文献志、族谱等资料,对宋元徽州境内的宗族义庄与义庄规约作一专题讨论。

一、宋元时期的休宁下东金氏宗族

(一) 宋元休宁下东金氏宗族的形成与裂变

文献记载表明,休宁下东金氏宗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唐末金文昌由京兆避乱迁江南——后唐初,文昌子仁用迁居休宁县城惠化坊(后更名文昌坊),衍生出文昌坊金氏宗族——南宋前期^④,金安民、安节兄弟自文昌坊迁居下东,繁衍为下东金氏宗族的裂变、演进过程。休宁境内文昌坊——下东金氏宗族的这一裂变、演进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徽州多数宗族始祖由北中国向南迁徙至徽州、由“一本”繁衍为“万枝”、由母族裂变为子族的宗族发展、成长的一般路径和样态。

从徽州宗族早期发展史看,徽州境内的金氏主要分布于休宁、婺源二县,其中尤以休宁境内分布最为广泛,占据绝对优势。据统计,明嘉靖年间编撰成书的《新安名族志》,收录了休宁县境内的峡东、朱紫巷、中街、潜阜、洲阳干、琅溪、棠源、汪溪、协路、梅结中村、杯坑、西克、上洲、南街、西山、白茅、坞里、永南、五城、方田等20个金氏族派,以及婺源县境内龙槎金氏1个族派^⑤。明天启年间或稍后编撰成书的《休宁名族志》,收录了休宁县境内的文昌坊、峡东、心田、大榧、十都(白马桥)、旌孝坊、朱紫坊、中街、西山、糜村、上峡东、汪溪、协路、褒源、新务里、棠源、梅结中村、古楼、洲阳干、琅溪、瓯山、西村、上洲(在邑南界)、小塘、南门等25个金氏族派^⑥。从上述金氏各族派的历史记载看,文昌坊金氏是为数不多、较早迁居徽州且科举仕宦人才辈出的名族之一。

① 王卫平:《从普遍福利到周贫济困——范氏义庄社会保障功能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 关于宋元时期义庄的研究详情,可参见李学如、刘思瀚等学者的综述。具体见李学如:《宋代宗族义庄述论》,《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李学如:《20世纪以来的宗族义庄研究》,《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刘思瀚:《近三十年来范氏义庄研究简述》,《泰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等等。

③ 学界对与宗族义庄有较大关联的宋元徽州族田曾有所涉及,参见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9-312页;陈瑞:《元代安徽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利用》,《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陈瑞:《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等。

④ 此处时间,据族谱所记金安民“生宋元祐辛未(六年,1091)十月初三日……置别墅于邑之下东,晚年与兄弟自文昌坊移居之。……乾道丁亥(三年,1167)年卒”推断,大约在南宋前期绍兴至乾道年间。见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明正德十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⑤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名族志》后卷《金》,黄山书社,2007年,第647-656页。

⑥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黄山书社,2007年,第671-714页。

收录于明《休宁名族志》且名列休宁金氏第一位的文昌坊金氏的相对可靠的历史,最早可从唐末京兆人金文昌迁徙江南说起。明《休宁名族志》云,“尚八,讳文昌,唐季由京兆避乱迁江南”^①。明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云:“一世:江南祖,尚八府君,讳文昌,京兆人。唐末避乱,挈家居江南。”^②“唐末,惧厄于兵,因逸江南。”^③上述记载表明,金文昌因担心受到唐末北中国战乱牵连而主动迁往江南避祸,关于其迁徙的目的地和落脚的具体地点,文献未作明确交代。金文昌是金氏迁江南一世祖,被尊为“江南祖”。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5),金文昌子仁用始迁歙州休宁惠化坊(后更名文昌坊),“筑室惠化坊,居之”,是为休宁文昌坊金氏(明正德谱简称为“文昌金氏”)一世祖。仁用定居后,“娶邑中苏氏,有贤行,助立家门”,在其妻协助下,“经营创置,遂成大家”。仁用生子应辰,“好学明经,累征不起,为时名士。以孙安节贵,赠通奉大夫。”应辰娶洪氏,生子裕,“积德行义,为时闻人。笃教诸子,虽倾产不惜。以子安节贵,赠通议大夫。”裕娶工部侍郎朱晞颜姑母,朱氏“有妇道,孝舅姑,勤纺绩,以为教子之费,遂至显宦。”^④裕生子四人:安仁、安道、安礼、安节。其中,长子安仁,“潜心笃学,不以得失累其心胸,以弟移恩,授承事郎。”次子安道,“由太学授承务郎”^⑤。安礼、安节事迹,详见于后。

早在宋代,文昌金氏第4世和第7世即已向休宁城郊和县城内不同街坊迁徙,裂变出下东、朱紫坊、旌孝坊等支派:“通奉,讳安民,下东派”,“承事,讳安仁,朱紫坊、旌孝坊派”^⑥;安民“迁峡东”、安节“同兄安民迁峡东而世居焉”,安仁“曾孙风光迁朱紫坊,龙光迁旌孝坊”^⑦。

下东金氏得名于休宁县城西北方向的“下东”。关于下东,明正德谱云:“下东在县西北二里,更名厦栋。”^⑧明成化八年(1472)金安节11世孙、辰州溆浦县丞致事金忠义所作《厦栋记》云:“休宁西北二里许,有地曰厦栋。何谓而名焉?其地东有千顷之坂,西有一带之流,南有市廛之衢,北有松萝之嶂,中辟一基,宽平可敌邑治,旧称下东者是也。已而为巨栋之厦,好事者为之名曰厦栋,盖以下东二字作反音耳,实金氏家之。金之先,本居辅郡京兆,自汉晋隋唐,代有显宦,唐季遭世僭窃,不遑宁处,有讳尚八府君者避居江南,生大三府君,徙歙休宁邑南之惠化坊。四传至宋通奉公、尚书公兄弟者出,更惠化曰文昌,置厦栋别墅,自文昌而迁居其地,以大其族。”^⑨从中可知,“下东”得名于“其地东有千顷之坂”,即因地形地势而得名。由于下东金氏所居地方“宽平可敌邑治”,周遭的自然、农业、商业与交通环境优越,加上金氏投巨资“置厦栋别墅”、建有“巨栋之厦”,宗族建筑群雄伟壮观,在当地十分抢眼,因而,好事之人又将“下东”称为“厦栋”。“下东”又被称作“峡东”,如明《新安名族志》云:“休宁:峡东在邑西北三里。……安民……与弟安节迁此。”^⑩明《休宁名族志》云:“峡东在邑西北三里,出文昌坊……安民……置别墅于峡东,与弟(安节)移居之。”^⑪由上可见,由母族休宁文昌金氏裂变而来的子族“下东金氏”,在当地,或因拥有象征财富的“巨栋之厦”“厦栋别墅”这一显著地标而被称作“厦栋金氏”,或因地处山峡之东、“溪之东”,占据山峡、溪水这一颇具标识性地理景观而被称作“峡东金氏”。

金安民、安节兄弟开族下东后,宗族在新的迁居地得到发展壮大。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大约至元

①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第671页。

②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③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江南祖》;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1《谱图一》。

④ 上述族人事迹,未加注者,均引见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⑤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第672页。

⑥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1《谱图一》。

⑦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第671—672页。

⑧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列土》。

⑨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9《记》,[明]金忠义《厦栋记》。

⑩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名族志》后卷《金》,第647页。

⑪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第672页。

明时代,从下东金氏宗族又裂变出心田、大榷、十都(白马桥)等族派^①。

(二)宋元休宁下东金氏的仕宦成就与宗族转型

自南宋前期金安民、安节兄弟开族下东后,下东金氏培育出了一大批科举仕宦人才:“二公相传以来,历元抵于国朝,英贤间出,有为知府、朝议者,有为判府、参议者,有为将仕、登仕者,有为教授、教谕者,文章政事后先相望”^②。在雄厚人才资源和卓越事功政绩支撑之下,下东金氏逐渐发展成为徽州乃至江南一带颇有影响力的科举仕宦型宗族。

下东金氏始迁祖为金安民、安节兄弟。金安民(1091—1167),又名安礼,北宋哲宗元祐至南宋孝宗乾道年间人。以辛勤劳作、擅于经营农业而致富发家。族谱记载安民事迹云:“通奉公讳安礼……勤劳起家,遂至殷富,置别墅于邑之下东,晚年与兄弟自文昌坊移居之。鼎新居第,更名厦栋。其地东庄西圃,南畴北陇,背郊野,面溪山,决取金竭金渠,自居至阳山之巔,田土为其全业。外有郁山药师院、崇寿观、齐云岩、富瑯、儒学前、白马桥、凤山觉林庵等处之产,俱有签税。虽富贵,无骄态,念弟尚书公当官清慎,致事隐于家,贫无资给,凡寒暑上下之费,一一应之。白首相聚,人以椿津称誉。”^③在迁居下东前,安民已利用自身财富经营此地,并在当地建立别墅,为晚年移居作了前期准备。正式移居下东后,安民对居住区域进行了拓展,并在居第周遭广辟庄圃、田土,其所创置的产业也溢出下东一带,分布极为广泛,且所有产业皆通过官府签税而获得合法保障。安民虽富贵,却为人低调,考虑到其弟安节居官时清廉谨慎,致仕归家后,资财给养贫乏,无法自给自足,遂予以慷慨接济,独自承担了各方面的开支费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安民是下东金氏的开族、立族功臣,为下东金氏宗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产业基础。

与兄安民相比,安节则以科举仕宦的精彩人生履历闻名于世。金安节(1095—1171),北宋哲宗绍圣至南宋孝宗乾道年间人。正史、方志、族谱等诸种文献对安节的事迹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明正德谱云:“尚书公讳安节……登宣和六年沈晦榜进士,调洪州新建主簿,期岁而荐章七上。秩满,范丞相引为删定官。当绍兴初,法令散逸,凡专司法令,皆安节所修次。书成,会广中得旧本上之,略同。旧例,改秩后率迁,安节独滞故官。后谢祖信迁寺丞,见宰相,曰:‘金删定改官在众人之前,以不事请谒无为言者,祖信不敢先之。’任满,还官。明年,召对称旨,高宗曰:‘金安节,好士人,若益涵养,有用之才也。’除司农丞。七年五月,擢监察御史。……寻迁殿中侍御史。秦桧方得君,进其兄梓知台州,连章论其倖冒,竟罢之。寻以急告去朝,坐是闲废十有八年。家贫,祠禄不给,处之自如。桧死,起知严州,提点浙西刑狱,入为大理宗正少卿。在卿寺凡四年,有言其独立无援者,上曰:‘朕亦知之。’迁礼部侍郎。谢日,面谕曰:‘卿久合作从官,继兼侍读。’迁给事中。孝宗即位,诏给廷臣笔札,条当今弊事。……在职封驳甚多。其在高庙朝,封还殿院杜莘老出守之命。至是,论潜邸恩除阁职者尤为切,至两朝皆优容之。后拜兵部侍郎。数月,求去,得请。给事中胡铨援韩愈留孔戣及近例缴奏,上从之。隆兴二年(1164)正月,迁吏部侍郎,寻权尚书兼侍读,告老益力,诏以敷文阁学士转一官致仕。赐对衣金带鞍马。时去郊祀才数日,特许奏荐不降等。陛辞,面赐金鱼。去都,多叹美者,太学生百余人伏阙三上书,乞召用。乾道六年(1170)卒,年七十有七。遗表闻,赠通奉大夫,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谥忠肃。……《宋史》论曰:安节拒秦桧,排渊、覲,坚如金石,孤立无党,死生祸福,曾不一动其心。有古大臣风烈,(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者欤?”^④安节在科举

①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第677—678页。

②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9《记》,[明]金忠义《厦栋记》。

③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④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宋史》为安节列传,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86“列传”第145“金安节”,中华书局,1977年,第11858—11862页。正德谱《事略》所记内容,与弘治《徽州府志》卷7《人物一·勋贤》基本相同。受编撰体例影响,晚明成书的徽州府、县名族志,对于金安节的记载,则有极为简略的表述,称其死后,“祀府、县学勋贤祠”,被誉为“南渡后完名节一人而已”。见[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名族志》后卷《金》,第647页;[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第672页。后起的明代徽州方志、名族志对于安节事迹的记载,较《宋史》更为丰满,且各有侧重。

仕宦方面的巨大成功,极大地提升了下东金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在安节直接提携与影响之下,随后,下东金氏族人在科举仕宦方面不断取得成功。与兄安民一样,安节也是下东金氏的重要开族、立族功臣,为下东金氏宗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基础。

自安节始,下东金氏在科举仕宦方面不断取得新业绩。举其荦荦大者,如下东金氏第2世:金俛,安民子,以文章立身,“初授提举司官,时叔尚书公(指金安节)致事,特许奏荐不降等恩泽付畀侄俛承授^①,升黄州知府,赠中议大夫”;金侑,安节长子,授文林郎,四川总所干办公事;金侃,朝散大夫,扬州府通判。第3世:金文郁,俛子,官至英德府知府,升中议大夫;金簠,侑长子,朝请大夫,瑞州通判;金簠,侑次子,承直郎,泉州检踏官;金簠,侑三子,通直郎,吉州太和县丞;金简(1188—1258),侃子,安节孙,“嘉定十一年调潭州司户……历知奉新县,通判兴国军,监左藏及封桩库,出知临江军、常德府,迁太府丞、浙西提举、将作监,进直龙图阁”^②。第4世:金大镛(1227—?),文郁子,“以经学登第,授朝奉大夫,制置使司参议”^③;金以孝,宣议郎^④。

由上可见,下东金氏第1至4世,所处时代为南宋,这一时期是该族发展的黄金期,该族凭借科举和恩荫等政策和制度优势,涌现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中高级官员,有些族人如金安节,长期居于庙堂之上,成为皇帝身边的股肱大臣和“红人”,金文郁、文刚等地方大员也不少出。

入元之后,下东金氏宗族发展开始出现重大转型,主要体现为:

第一,随着元朝文教与选官用人政策的重大调整,下东金氏科举仕宦人才剧减,与南宋所拥有的巅峰极盛态势相比,呈现出一种断崖式下跌的趋势,即使偶尔出现一些官员,也多为低级微末小官,甚至不入流。如,第5世金得、金聪、金宣三人,约为南宋后期至元初人。金得,将仕郎,湖州路儒学教授;金聪,台阁编修;金宣,将仕郎,宣州宛陵驿官^⑤。第6世金梁之,元代人,奉新县尉^⑥。第7至9世近百年间,甚至未见有族人担任官吏的文字记载。

第二,宗族领导者身份发生显著变化,即由原先的中上级官僚主导或管理宗族事务转变为由一般平民主导或管理宗族事务。据族谱记载,入元后,下东金氏的家庭、宗族事务多由被标签为“处士”的普通人操持。如,第6世:金梁,“器宇轩昂,丕整先业”;金沅,“有才德,隐居不仕。增置器业,以正家门”;金楚,“柱石当家,不避危险,尝祠奉祀”。第8世:金英,“才姿俊杰,礼义传家,保守终年”;金和,“居处和睦,保己成家”;金福,“营家立业,不坠家声”。

第三,在族人职业选择和职业构成方面,平民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高官显宦已不见,“士”的比重较低,“商”的比重有所提升。一些下层文人只在休宁县范围内特别是乡里社区开展交游和学术文化活动,如第8世金厚,“通五经,与定宇陈先生为友,有往来书启,载诸文翰”,“至元己卯(五年,1339)与倪仕[士]毅试浙闾不得,隐不起。”一些族人开始从事商业经营,农商兼业现象出现,如第8世金相,“以农商为业”^⑦。

综观休宁下东金氏宗族发展史,该族发展的黄金期在南宋,以科举仕宦闻名,这一时期,该族是典型的科举仕宦型宗族。元代,随着科举和恩荫等政策和制度红利的消失,该族科举仕宦人才剧减,宗族形态开始发生急剧转型,由中上级官僚主导的科举仕宦型宗族跌落为低级微末小官、一般平民主导的庶民

①《宋史》云:“安节至孝,居丧有礼。与兄相友爱,田业悉推与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俛。”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86“列传”第145“金安节”,第11861页。

②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③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第673页。

④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⑤ 上述三人事迹,见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⑥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金》,第673页。

⑦ 上述族人事迹,未加注者,均见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型宗族。晚明编撰成书、颇具影响的府、县名族志——《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尽管仍将下东金氏作为收录对象，但该族在南宋时期曾拥有的威势和影响力已显然不在。

二、南宋时期休宁下东金氏宗族义庄的设立

义庄是北宋新出现的一种地方赈恤组织和义田“管理机构”。由宗族好义之士捐献给义庄的土地，称为义田。义田收入的农产品在义庄储藏起来，用以救助族人和乡邻。“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①。有些时候，义庄又与义田混称^②。义庄肇始于北宋范仲淹，范氏于北宋皇祐二年（1050）在长洲、吴县创立义庄。范氏义庄实践多受到他人效仿，“宋代官僚富室争相效法，买田建庄赡族。”^③“官僚士大夫争相仿效，义田遂成为官僚士大夫用以收族的重要手段。”^④

南宋休宁下东金氏宗族义庄是由族内官僚第3世金文刚、文郁从兄弟及文郁子大镛三人或倡议设置或具体践行的。遗留下来的一份南宋公据，对下东金氏宗族义庄从倡议设置到具体落实的过程有所交代。这份公据文献十分珍贵，现逐录如下：

亡宋公据。金朝散申：照对英德知郡亲从兄弟，昨英德弟家居之日，因聚话之顷，慨念寒宗子孙蕃衍，居贫者多，不可无以资给之，拟效乡先达汪寺丞、许郎中创立义庄之遗意，事未克竟，而英德弟遽尔捐馆。后嗣侄大镛克绍先志，拨户下田九十余亩，计租一千石，以充义庄之用。本官尝摭诸家规约条画，宜创造庄宇，悉已周备。但念垂远之谋，非藉官府主盟，无以禁防后弊，申乞送案给据，以为悠久之传，则阖族俱拜盛德之赐。仍乞帖县照会。奉判府焕章大监台判案，呈给使案，具呈案官书拟，欲并备所申给据，仍帖县照应。奉判府焕章大监台判行，除已帖县外，须至给据者。

右给据付 金知府宅收执照会。准此。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给 据。

使 押^⑤

公据是由封建官府为个人和组织出具的证明某种人身、财产、权利关系的文书。在宋代，发挥证明文书作用的公据得到广泛使用。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五日诏：“诸大中大夫、观察使以上，每员许占永业田十五顷，余官及民庶愿以田宅充奉祖宗飨祀之费者，亦听。官给公据，改正税籍。不许子孙分割、典卖，止供祭祀。有余，均赡本族。”^⑥封建官府通过颁给公据，专立税籍，作为高级官员永业田、一般官民墓祭田的产权证明^⑦。上引淳祐十一年（1251）十二月初三日公据，就是一份官府因下东金氏官僚金文刚申请而颁给的、确保义庄产权不受侵犯的证明文书^⑧。

① 王善军：《范氏义庄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② 如南宋休宁东阁人许文蔚，“倒囊买田百余亩为义庄，以赡宗族”；同时又说：“东阁文蔚公置义学、义田，以赡宗族。”见[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3卷《许》，第565页。

③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④ 王善军：《宋代族产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⑤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下东金氏义庄赡茔》。

⑥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61，中华书局，1957年，第5904页。

⑦ 张东光：《宋代官方公据文书略说》，《档案学通讯》2019年第1期；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⑧ 与之类似，南宋休宁人许文蔚也曾通过“申省立约”，借助政权力量以确保宗族义庄产权的长久安全。如，弘治《休宁志》卷9《人物二·儒硕》云：“买田百亩为义庄，以膳宗族，申省立约，为悠久计”；弘治《徽州府志》卷7《人物一·文苑》云：“买田百余亩为义庄，以赡宗族，申省立约，为悠久计”。

在上引公据中,“本官”“金知府”,即下东金氏第3世金文刚。文刚曾“出知临江军、常德府”^①,故称其为“金知府”。“英德知郡亲从兄弟”“英德弟”,即下东金氏第3世金文郁。文郁,曾“任英德知府”^②,“官至英德府知府”^③。所谓“从兄弟”,“从兄”是指祖父的亲兄弟的孙子中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从弟”是指祖父的亲兄弟的孙子中比自己年龄小的人。下东金氏第1世安民、安节为亲兄弟。安民第4子隼的长子为文郁,安节第2子侃的独子为文刚。因而,文刚、文郁为从兄弟关系。“侄大镛”,即下东金氏第4世金大镛,文郁子,文刚侄。“乡先达汪寺丞、许郎中创立义庄”,是指南宋休宁人汪泳、许文蔚创设宗族义庄之事。汪泳,休宁旌城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历湖口主簿,蒲圻知县,提辖榷货务,主将作监簿;迁大理丞;历知泰、湖、处三州,以中奉大夫致仕;封休宁县男,赠通议大夫。汪泳有“膳族之仁”^④:“晚居吴中,以其田之半与诸弟,且置田百亩于歙,以膳先茔,给宗族。”^⑤“晚居吴中,有田数顷,以其半均与诸弟。又念先茔在歙,买田一百亩备岁时祭享,外悉以给宗族。”^⑥许文蔚,休宁东阁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历官通州教授、海陵丞、国子学录、国子博士、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秘书丞兼兵部郎官,累迁著作郎。志书记载其创设义庄之事云:“平生笔耕所储,倒橐买田百余亩为义庄,以赡宗族。”^⑦“平生笔耕所储,倒橐买田百亩为义庄,以赡宗族贫者。”^⑧“平生笔耕所储,不以私子孙,倒橐买田百余亩为义庄,以赡宗族。”^⑨

从公据中可以看出,英德知府金文郁家居时,目睹族人贫富分化严重,感慨族中寒支“子孙蕃衍,居贫者多”,准备效法同邑官僚汪泳、许文蔚创立义庄以济族的先例,倡设本族义庄以资助贫困族人。在提议后不久,金文郁突然去世,设立义庄之事被搁置。后来,文郁子大镛继承先父遗志,划拨户下田产,成功设立了下东金氏宗族义庄。

关于下东金氏宗族义庄设立一事,淳祐九年(1249)六月,当事人金大镛云:“粤自先考英德知府居逸之时,环视父族,有未优给,慨然有置立义庄之意。暇日,与伯父临江判府商之,嘱大镛行之。适伯父开藩清江,而大镛勿务汨汨,以故罔获讫事,此念未尝少释。会伯父解职来归,而大镛亦得休息故庐,遂拨田近顷,为谷满千,成于己酉之六月。适遇岁稔,田膏而谷实,若造物有以相之者。虽然无本不立,非人不行,经画数年,成就一日,使大镛得继先志,以上慰九京之望者,实藉伯父判府张主之力也。”^⑩此处“先考英德知府”,即大镛父文郁;“伯父临江判府”,即大镛伯父文刚。从中可以看出,与前述淳祐十一年公据中所述基本一致,文郁家居期间,看到不少族人生活贫困,于是有置立义庄的想法,并与其从兄文刚商议,将置立义庄一事嘱交其子大镛具体落实。然而,由于文刚、大镛一直任官在外,无暇操办义庄之事。直到淳祐九年六月,文刚解职归家、大镛得闲居家休息,两人亲自过问,大镛“拨田近顷,为谷满千”,才将置立义庄一事办成。下东金氏义庄田段主要分布于休宁县忠孝乡、安乐乡、由山乡境内,义庄实行租佃制,可收租谷1003.5秤^⑪。

除族谱记载之外,下东金氏设置义庄一事也受到弘治《休宁志》、弘治《徽州府志》、程敏政辑撰《新安

①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②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③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名族志》后卷《金》,第647页。

④ [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70《行实·儒硕》之程端明《许著作文蔚墓志铭》,黄山书社,2004年,第1709页。

⑤ [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之《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本郡·宋》,第1册,第20页。

⑥ 弘治《徽州府志》卷9《人物三·孝友》。

⑦ 弘治《徽州府志》卷7《人物一·文苑》。

⑧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名族志》后卷《许》,第473页。

⑨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3卷《许》,第565页。

⑩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制参自序开具田亩镌刻石碑》。

⑪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制参自序开具田亩镌刻石碑》。

文献志》等志书类文献的关注:金文刚“慕范文正公故事,置祭田,立义庄,画为定式,俾世守焉。”^①“慕文正范公义田,与其季英德史君文郁,约共为之。英德卒,其子大镛市田百亩以先,公喜曰:‘汝父不死矣!’及来浙右,以俸赐三万缗益之。又为祭田,春秋祀事皆有式。”^②金大镛“尝与叔金文刚置立义田百亩,以备祭扫先墓之礼,余惠族之贫者。”^③上述记载表明,淳祐九年(1249)六月,金大镛按照先父文郁的嘱咐,率先购置田亩,设立义庄;宝祐五年(1257),金文刚到浙江任职后,又以自己的俸禄和所得赏赐三万缗作为义庄建设的追加经费。下东金氏设立义庄的目的是赡莹墓祭和赈济族贫,且有先祖宗赡莹、后济贫恤族的次序安排。

在金大镛拨田设立义庄两年后的淳祐十一年(1251)十二月,该族又增置了义庄田亩,合计上谷422秤^④;宝祐元年(1253)三月,“续置田段”,合计上谷65秤^⑤;加上宝祐五年金文刚任浙西提举后捐俸赐作为义庄建设经费;这说明,在南宋,下东金氏义庄建设一直受到族内官僚士大夫的重视而得以健康运行。诚如学者所指出,在宋代,“建置族田义庄对族人实行经济协济,是当时宦室大族联系族众更为重要的一种方式”^⑥;“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⑦。下东金氏官僚士大夫面对族内贫富分化、贫困族人生计维艰的现实,积极效仿他人创设义庄的做法而置立本族义庄,这是通过物质手段济贫收族、凝聚人心、实现对所在宗族进行有效治理的一种务实举措。

三、宋元时期休宁下东金氏宗族义庄规约与义庄管理

(一)南宋休宁下东金氏义庄规约与义庄管理

与淳祐九年六月金大镛设立宗族义庄差相同时,其伯父、解职居家的金文刚“摭诸家规约条画”^⑧,“披阅文正范公及诸家规约,择简易可行者,参之众论,条列于编”^⑨,即在借鉴范仲淹所订范氏《义庄规矩》及其他宗族相关义庄规约中“简易可行”条款并结合众人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符合本族实际、富有操作性的下东金氏义庄规约。同年同月,金大镛提及:“右具在前拨付义庄输税管业,其条画并遵尊长临江判府所立规约施行。”^⑩可见,下东金氏对于宗族义庄的管理与运作是遵照金文刚所订义庄规约进行的。

淳祐九年六月金文刚制订的义庄规约为纸质文本,到了宝祐元年三月,或是为了方便观览与参照执行,下东金氏将纸质文本的义庄规约刻在了木板上并张挂于族中显著位置,形成《义庄板榜规约》。此种《义庄板榜规约》在徽州历史上并不多见,现录于下:

切见义庄之设,所以嘉惠族党者甚厚;规约之立,所以维持义庄者备至。况庄以义名,尤望夫相与以义也。苟不笃规约,是远而使利乎己之私,所谓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坏之而有余,岂不辜前人创置之美意哉?今义庄已定而规约未立,因披阅文正范公及诸家规约,择简易可行者,

① 弘治《休宁志》卷9《人物二·儒硕》;弘治《徽州府志》卷8《人物二·宦业》。

② [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70《行实·儒硕》之林直院《宋故朝奉大夫直龙图阁金公文刚墓志铭》,第2册,第1714页。

③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④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增续赡莹义庄田段规约》。

⑤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义庄板榜规约》。

⑥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第44页。

⑦ 王善军:《范氏义庄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⑧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下东金氏义庄赡莹》。

⑨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义庄板榜规约》。

⑩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制参自序开具田亩镌刻石碑》。

参之众论,条列于编,庶可以永其传。

今具规约画一于后:

一、义庄租额谷管一千秤有奇,逐年随所收,除存留、输纳二税及修筑、备水旱之费外,余者斟酌支给,分作二次,当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各一次,不许私自擅支及假借。如有存剩者,照时价发巢,桩管价钱,以备支用。

一、义户人口,不问男女,以二十以上为大口,二十以下为小口。其小口所给,减大口之半,女出嫁勿给。遇有生长男女,各要半年内报掌事人注籍,违限不报,后年长不理为口数。如审会了毕,即时附籍。若籍后一年内更不更改,或义户单身无妻儿住家者,许附亲房口数内支请。如亡歿者,照口数销落。

一、义户支请,若计口数,似于繁多,倘不论多寡,一等支给,又恐不均之患。今以口数多寡分为三等,庶可适平。

一、义户与本宗人并不许耕作义庄田,诡名者同。如违,阁支。其佃人或有抵顽负、不遵告谕者,参之众议,亦与改佃,不受情轻易更替。其义庄佃户所合优恤,使之安业,不许辄有骚扰及私自役使。如违,议罚。

一、诸房嫁女,支会五十千,再嫁,减半。娶妇,支会五十千,再娶,不支。候婚姻有期,诸位保明申到,方许支给。如有妄冒,保明人阁支。

一、诸房丧葬,如是长上有丧,先支会三十贯,至葬事,又支会二十贯。卑幼二十以上丧葬者,通支会二十贯文。

一、今众议委请掌管,凡有合行事务,亦要公心,同共区处,不许自立异见,引惹浮议。

一、委请本宗公当、为众所推服者掌管其事,所掌看兑、收租、支给、修筑田亩损伤去处,遇水旱用工救庠,输纳二税,及义庄内一切事件,凡出入支遣[遣],并要公当,逐一具帐。如有侵犯及不公心管干,许族人纠察,定当议罚。如将来愿替者,许众人推择委请。

一、遇有规约不载及不尽事理,掌管人与诸位议定,保明申主盟尊长位,须待回报,方许施行。

一、所拨义庄田亩,并誊写字号、亩步入砧基簿,经官印押,收在尊长位,永远照用。如有添置田亩,续次编入。

右具于前,各宜循守。

宝祐元年三月 日^①。

该《规约》主要包括引言与规条两部分。引言开宗明义指出制订规约对于长久“维持义庄”的重要性,以及忠实执行规约对于规避个人私利、维护宗族公利、不辜负前人创置义庄美意的重要意义。规条共计10条,是该规约的核心部分,大约可归类为5个版块。

第1版块主要是围绕义租谷分配这一主题所作的制度规范,包括第1、2、3条。第1条主要讲义庄租谷分配环节的一些问题。强调收租后,在确保存留、纳税、修理相关设施及防备水旱灾害各项费用之外,剩余租谷分作两次,酌情分配给相关族人,但不得私自违规擅支与外借。若配给后仍有剩余,则按市场价巢卖,所得价钱须加以妥善保管,以备适时支用。第2条主要讲接受赈济家庭——义户的大、小口划分及其义租谷的分配标准以及新生人口管理等问题。强调对新生人口进行规范化管理,族内设立专门簿籍,对新生人口实行限期申报登记制度,对新生人口违限不报者,长大后剥夺其接受赈济的资格。对于未及时“注籍”的新生人口,以及孤立无援的单身住家义户,允许其附籍于亲房申请赈济。接受赈济人口亡故后,予以注销。第3条主要讲接受赈济家庭的义租谷申请与支给问题。强调坚持适度、均衡原

^①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义庄板榜规约》。

则,根据人口多寡将义户分为三个分配等级。此处下东金氏义租谷的分配方式,多仿照范氏义庄的方法或略加变通^①。

第2版块即第4条,主要是围绕义庄田租佃耕作这一主题所作的制度规范。强调义田实行族外招租制度,族内义户与其他族人不许租佃耕作义田,违反规定者,暂停赈济。租佃人若有违背契约、梗顽抗拒、不遵劝告者,改佃换人;对于改佃,要慎重对待,不得受个人情感支配而轻易换人。对于义庄佃户应予以优待照顾,使之安于本业,不许无端骚扰和私自役使,违反规定者,予以惩罚。

第3版块主要是围绕族人嫁娶丧葬资助这一主题所作的制度规范,包括第5、6条。第5条主要讲对嫁女娶妇家户的资助问题。确定首次嫁娶、再嫁、再娶的资助标准。规定申请嫁娶资助时,必须要有保人作保,方许支給。如有妄冒情形,保人负有连带责任,暂停对保人的赈济。第6条,主要讲对族人丧葬的资助问题。确定对年长者、卑幼二十岁以上者丧葬之事的资助标准。

第4版块主要是围绕义庄管理者掌管人这一角色所作的制度规范,包括第7、8条。第7条主要讲委托、聘请掌管人管理义庄问题。强调掌管人遇事要出于公心、共同处置,不许个人发表不负责任的异端见解,以免扰乱人心。第8条,主要讲掌管人应具备的素质、管理职责、失责处罚等问题。强调掌管人应具备办事公正允当、为众人所推许信服等素质;掌管人管理义庄事务要做到公正允当、账目清楚。若掌管人侵犯公众利益或管理义庄事务未出于公心,允许族人督察检举,予以处罚。若遇到掌管人申请更替,允许众人推选委请其他合适人选。

第5版块主要是围绕主盟尊长即族长这一角色以及规约未载及未尽事宜、义庄产业登记管理所作的制度规范,包括第9、10条。第9条主要讲如何处置规约未载及管理中的未尽事宜等问题。强调,倘若遇到上述情形,掌管人须与众人商议,作出担保并向族长申告,在得到族长明确答复后,方可施行管理。由“掌管人与诸位议定,保明申主盟尊长位”可知,南宋下东金氏宗族义庄管理是以掌管人为首组成一个由多人构成的管理班子,遇到重大事项或难题时,则需要向族长报告,寻求其最终裁定。这也间接说明,该族的义庄管理是一种族长领导下的科层式管理。第10条,主要讲义庄产业登记管理问题。强调将义庄田亩、字号、亩步等信息登记入砧基簿,并将砧基簿申请官府钤印签押后,交由族长保管。如有新增产业,陆续按次序编入产业簿册。

可以说,经由金文刚订立的纸质文本的义庄规约以及4年后刻于木板并张挂的《义庄板榜规约》,涉及主盟尊长(族长)、义庄管理者、义田租佃耕作、义租谷分配、族人嫁娶丧葬资助、义庄产业登记管理、规约未载及未尽事宜处置等诸多方面,对义庄经营管理与族人赈济救助等许多重要的方面都做出了制度设计与规范,内容系统全面,条理清晰,针对性、可操作性与约束性强,是南宋时期下东金氏宗族内部一项重要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与法规,是一份确保宗族义庄管理与运作制度化、规范化的专门性规章。

(二)元至元年间休宁下东金氏义庄规约与义庄管理

1.《壬午年续置规条》

宋元易代后,元至元十九年(1282)六月,下东金氏族人金贵乙在金文刚所订义庄规约的基础上,因应形势变化,亲自口述、续订了《壬午年续置规条》。该《规条》云:

壬午年,义庄出纳等事,以行列资次,合是千四兄长朝奉同某共管。但某思之影只颇倦,恐心力有所不逮,未免与千四兄长商议,请千四兄长照前来体例,任提纲之职。某与众位除在幼人之外,共一十二位,并请公心管办庄内事务,仍依前硬租六分半,不以旱涝丰熟,永为定例,庶得利害惟均,族党辑睦,实为悠远之规,不负先尊长美意。谨逐一再行开具合当事件于后:

一、提纲掌管交收、支出及印锁、仓教等事,并掌簿籍。

一、管年一十二位,共管看兑、除放、输纳官赋及应丁科征等事,内桂一第一位,本任掌事之

^① 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职,今亦只得俯从诸位管年,并掌簿籍。

一、管年一十二人,分为东、西位。东位系是桂一弟、贝三弟、万五弟、桂六弟、元三侄、懿侄,西位系是贵二弟、贵五弟、佛弟、元四侄、茂乙侄、元八侄,永为定例,不许参差。

一、看兑一项,若一行十二人并往佃家,费其饮饌,必致亏租。今来仍依上年分东、西二仓掌管,每边六人,须是从实。不许私与佃人通同,以多为少,瞒昧入己。提纲不测,前去核实,如有敝俸,公共屏黜,不许干预管年。

一、除放,请管年将佃人报帐拟数前来,提纲斟酌批放。如消折太多,请提纲亲临审实,方行批放。

一、租额硬还六分半之说,仍照前规。倘有消折,各以本身谷陪还。如不伏者,屏黜,不许管年。

一、交谷,除兑、放外,颗粒并要入仓,不许于佃人名下折钞入己,亦不许通同佃人坐欠,续行私取入己。如犯此约之人,定行屏黜,不许管年,并行阁支。

一、佃人或有坐欠些小,东、西仓各自齐心,及时催取。如有顽佃坐欠,至次年看兑时,先照例还足,方与看兑。

一、输纳一节,今年提纲同管年均行兑纳,不许推调。如推调不应限纳者,公众便行屏黜,永不许管年。

一、自今年以后,定是存谷在仓,提纲同管年封锁,候发巢、输纳,庶免临时有数先之挠。

一、支俵,照旧规,随支遣、存留外,随多寡分俵。其支遣数目,非提纲对众公平批注,不在理算。

一、祀先一节,自除膳莹正行支用外,每年仲春,仍请管年各将纸钱分去标墓,庶子弟知有祖宗。为子弟者,惮劳不到墓所,提纲觉察得知,准不孝不悌论,定行阁支。

右具如前,各宜循守。

至元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具^①。

该《规条》包括引言与条款两部分。引言中提及的“千四兄长”“千四兄长朝奉”^②,当为下东金氏第5世金资,为该族族长^③,元初人。文献中有关此人的信息记载不多,明正德谱《谱图二》云:“千四公讳资”,说他是六公希云长子^④;《事略》云:“千四公讳资,葬富瑯山,娶江氏,葬同处,共穴。”^⑤综合族谱相关记载看,此人为金文刚、文郁孙辈,金大镛的侄辈。引言中提及的“某”,当为下东金氏第5世金贵乙,即“贵乙叔长”^⑥“贵乙宣议”^⑦,元初人。关于金贵乙,族谱未见记载。

引言说,“壬午年”(至元十九年,1282)下东金氏“义庄出纳等事”,按照次序,应轮到第5世金资、金贵乙二人共同管理。但金贵乙感到自身孤单倦怠,惟恐心力不济,与兄金资商议,请他担任“提纲”一职,在义庄管理方面负总责。“提纲”一词,又见于“提纲尊长”^⑧一类称呼中,这里的“提纲尊长”类似于前述南宋“主盟尊长”在义庄管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金贵乙本人由于“头颅老甚,兼抱病耳聋”“既

①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壬午年续置规条》。

②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乙酉年终新置规条》,称其人为“千四朝奉”。

③ 由金贵乙称金资为“千四兄长”“千四朝奉尊兄长”,并自称“某虽既老且病,仍居一族次长,有不容坐视者”,可推知金资为族长。见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壬午年续置规条》、《乙酉年终新置规条》、《复柬》。

④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1《谱图二》。

⑤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

⑥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壬午年续置规条》。

⑦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乙酉年终新置规条》。

⑧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乙酉年终新置规条》。

老且病”^①以及孤单倦怠、力不从心等身心原因,未直接参与义庄具体事务管理,但也并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扮演了类似管理顾问、指导者的角色。引言中指出,由12位管年组成一个义庄具体事务管理班子,“公心管办庄内事务”。引言中还特别提及,下东金氏义庄地租“仍依前硬租六分半,不以旱涝丰熟,永为定例”,说明元初下东金氏义庄田租征收遵循先前的定额租制执行。

具体条款共计12条,大约可分为4个版块。

第1版块主要是围绕义庄管理者的管理权限与人员配置这一主题所作的制度规范,包括第1、2、3条。第1条主要讲“提纲”一职的管理权限问题。突出提纲在义庄管理中抓财权、事权重、负总责的特点。第2条主要讲“管年”一职的管理权限问题。指出,管年侧重于义庄具体事务的管理。从该条记载可知,在义庄事务管理中还设有“掌事”^②一职,从其管理权限看,这一职位介于提纲与管年之间。下东金氏对于义庄实行科层式的管理方式,存在一个“提纲—掌事—管年”自上而下的管理层级设置。第3条主要讲管年一职在族内的人员分配问题。强调,管年12人,分为东、西位,东、西位的人员分配,应保持均衡,并形成定例。

第2版块主要是围绕义庄管理者的具体管理事项这一主题所作的制度规范,包括第4、5、9条。第4条主要讲看兑,亦即到现场查看庄稼长势、评估收成、督促完纳田租问题。指出,看兑时,管年12人不能一同前往佃户家,在佃户家饮食花费,必然导致佃户拖欠租谷。从今往后,看兑仍依照往年分东、西二仓掌管,每边六人的惯例,如实进行,不得私下与佃户串通勾结,以多为少,欺隐中饱。如果提纲感到管年所述情形不实,前往核实,发现有营私舞弊行为,公同将管年罢黜,不许其继续从事管理活动。第5条主要讲除放,亦即因灾荒等造成减产亏损而减免佃户租谷问题。指出,遇到特殊情形需要减免佃户租谷时,先请管年将佃户所报账目拟定减免数额转报提纲,提纲则根据情形予以斟酌减免。如果亏损数额太大,则需请提纲亲临现场核实,方可予以减免。第9条主要讲输纳官赋问题。指出,至元十九年,向官府缴纳赋税,提纲与管年均要参与兑纳,不许推托。如有推托不按时限缴纳者,公众将其罢黜,永远废除其管理义庄的资格。此条强调宗族义庄对于及时缴纳国税的坚定态度。

第3版块主要是围绕义租谷这一主题所作的制度规范,包括第6、7、8、10、11条。第6条主要讲义租谷征收租制、数额问题,并指出,租谷征收实行定额租制。如有亏损,管年要以自身谷物赔偿足数。如有不服规约者,将管年罢黜,不许其继续从事管理活动。第7条主要讲义租谷上交入仓问题。指出,除了看兑花费、减免之外,租谷要做到颗粒入仓,不许管年违规中饱私囊。如有违规者,一定要予以罢黜。第8条主要讲催讨被拖欠的义租谷问题。指出,遇到佃户拖欠租谷时,义庄东、西二仓管年各自应齐心协力,及时催讨。如遇佃户拖欠不交,到次年看兑时,先让其按惯例还足欠租,方可进入看兑程序。第10条主要讲义租谷管理问题。指出,应确保租谷存谷在仓,提纲、管年共同封锁谷仓,等候随时发兑、输纳,以免有临时先行借谷等干扰。第11条主要讲义租谷分配问题。指出,除了各种开销及存留适当租谷之外,剩余租谷根据数量多少在族内进行分配。各种事项的开销数目,如果未经提纲当众批阅并签署意见,不得归入核算范围之内。

第4版块即第12条,主要讲墓祭祖先问题。指出,墓祭祖先,除了在赡莹专项经费中开支外,每年农历二月,仍需请义庄管年将标挂纸钱分给族人子弟前去扫墓。如有族人子弟无故不前往墓所祭扫,以不孝不悌论处,并暂停对其赈济。此条将墓祭祖先与接受义庄赈济相结合,敦促族人重视祖先祭祀,实为整合宗族的重要举措。

由上可见,《壬午年续置规条》是元初至元年间金贵乙顺应宋元易代后徽州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和下东金氏宗族发展实际而续订的一项重要的族内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与规章。这一《规条》既继承了南宋金

①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乙酉年终新置规条》。

② 在南宋宝祐元年三月《义庄板榜规约》中,已见“掌事”一职:“遇有生长男女,各要半年内报掌事人注册”。另,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乙酉年终新置规条》、《丙戌年新立规约》中有多处提及“掌事”一职。

文刚所订义庄规约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又在义庄管理者的管理权限与人员配置,义庄管理者的具体管理事项,义租谷征收、管理与分配,墓祭祖先等方面作出了许多与时俱进的修正,并添加新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与南宋金文刚所订义庄规约相较,该《规条》更加突出义庄的管理,更加强调宗族集体对义庄田土、佃户的控制,而对赈济的内容着墨甚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元易代后该族义庄经营管理或许遇到了社会动荡引发的某种困境以及宗族对义庄实践困境的应对与调适。

2.《丙戌年新立规约》

至元二十三年(1286)正月十五日《丙戌年新立规约》的订立,是在上一年年终下东金氏宗族内部众多义庄管理者围绕优化义庄管理运作的多次商讨与互动中实现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终,下东金氏义庄管年金佛孙等人在给提纲尊长金资(时为族长)与金贵乙(时为族中次长)的有关义庄经营管理的汇报性质的信函中说,当年由于各种开销费用繁多,导致申请赈济者获得的赈济太过简省。为了扭转这种尴尬的局面,金佛孙等人提出了另订规约的设想^①。为了商讨重订规约一事,以管年金佛孙等人为一方与以提纲金贵乙为另一方之间展开了多次信函互动,从中也可见下东金氏义庄管理运作过程中日益积累的弊端以及义庄管理者为规范义庄管理运作所作的持续努力。

接到管年金佛孙等人的信函后,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金贵乙回函如下:

某偕月淑弟,承佛哥暨诸侄惠讯,言及义庄今年因支遣繁多,各人支请似觉太简,欲别立规模,从长区处,此说颇合某与月淑弟之意。缘某头颅老甚,兼抱病耳聋,月淑弟又多为学馆所系,每年帐目不过据帐署名签字而已,中间委折,不欲尽述,徒丑外观。今截自至元二十三年为头,请族众、弟侄辈皆预看兑及公私管干收支,庶无欺隐之弊。某虽既老且病,仍居一族次长,有不容坐视者。在月淑弟,亦当共提其纲,不可辞责。贵二弟、元三侄两位,仍着掌事之劳,但不必亲去履亩,庶有体统。若诸弟侄辈或有因看兑通同佃人侵欺弊倖,请二位掌事采访得实,报某与月淑弟,当公共别行议罚,以为徇利伤义者之戒。所是应干公私收支帐目,望诸弟侄辈须是逐月见示,切不可因循过月。某老病不能亲历,只得令儿子楚老随侍诸位,一同看兑、管干收支,庶某与月淑弟皆知逐月帐目分晓。若夫每年佃人纳到鸡、酒微物,随掌事及管年诸位分俵,某断不较此。更望体认老者区区之意,切不可因此微利有伤尊卑上下和气。幸甚!仍望诸位便赐回报。

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某谨领某上启^②。

回函中的“某”,即金贵乙。金贵乙与回函中提及的“佛哥”“月淑弟”“贵二弟”3人属于同辈人。回函中提及,金贵乙有一个儿子,名叫楚老,一个侄儿,名叫元三。在回函中,金贵乙首先肯定了金佛孙等人欲重订义庄规约以便从长计议义庄管理事宜的设想,说这一设想契合他与月淑弟的意图。但他承认,由于自身年老多病,加上月淑弟身为塾师,精力受到学馆事务干扰,对于每年上报来的义庄账目,只不过是走过场、履行署名签字的程序而已。其次,金贵乙提议,为了克服义庄管理中存在的欺隐弊端,准备从至元二十三年开始,请族众、弟侄辈都参与到看兑、公私事务与财务收支管理中来。再次,金贵乙对义庄管理相关人事安排作了初步设想。他说,自己身居一族次长,应义不容辞克服身体困难,切实重视起义庄事务管理;建议月淑弟也应当与自己一同担负起提纲之责,不可推辞;金贵二、元三仍担任掌事之职,但不必亲往实地督察。最后,金贵乙对义庄管理中的一些具体事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其一,如果弟侄辈有因看兑串通勾结义庄佃户侵吞欺瞒、营私舞弊者,在掌事调查确实后,向他与金月淑报告,与众人一道进行议罚。其二,义庄一切公私收支账目,提醒弟侄辈管年逐月向他与金月淑报告,切不可拖延过

① 明正德族谱中虽列有一个《乙酉年终新置规条》条目,但并未见有具体的条款。紧接着该条目的是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金贵乙给管年金佛孙等人的回函。

②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乙酉年终新置规条》。

月。由于他年老多病不能亲自过问义庄管理具体事务,只好让其子楚老作为代理人,与诸位管年一同看兒、管理收支,以便他与金月淑对义庄逐月账目有清楚的掌握。其三,每年佃户缴纳的鸡、酒等物品,由诸位掌事、管年进行分配。

回函中再次证明,在下东金氏义庄管理中,存在着一个“提纲—掌事—管年”自上而下的管理层级,其中,提纲由族内年龄最长的数位长者担任,掌事由数位族人担任,管年由多位族人担任。提纲、掌事、管年,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义庄管理过程中,存在着提纲金贵乙因年老多病、精力不济,金月淑因塾师职业行为、精力受到干扰而不能完全胜任,管年串通勾结佃户侵吞欺瞒、营私舞弊,以及义庄账目管理敷衍、走过场、重形式等诸多问题。

在接到金贵乙回函后,以金廷辅牵头、包括金佛孙在内的诸位管年给金贵乙发出了《再上尊长柬》:

廷辅等蒙尊长批示,令廷辅等自至元二十三年为头,一同管干义庄贍莹事务。仰见主维公是,但每年虽有佃欠,至次年算帐之时,只是鹮突。廷辅等卑见,欲得尊旨,索出今岁佃人欠谷细单,点差一人,前去理取桩管,准备公私支用,逐月具帐申呈,方为允当。谨再此拜覆,伏乞尊照。

廷辅、新孙、佛孙、懿孙、周孙、通孙、汉英等拜复^①。

在《再上尊长柬》中,金廷辅等人及时回应了金贵乙提出的“自至元二十三年为头,请族众、弟侄辈皆预看兒及公私管干收支”的倡议,同时也揭露了在处理佃户欠账时所存在的敷衍应付、账目混乱不清等实情,提出了先在弄清上一年佃户拖欠租谷明细的基础上,派人前去办理清账,以便公私支用、逐月做账的请示。

接到《再上尊长柬》后,金贵乙在同一天发出了两份《复柬》:

每年佃欠鹮突之弊,皆非于桂[贵]二弟、元三侄两员固位不肯弃舍,所以如此。今拟乞请通侄^②主帑,仍令庄仆催索,随多寡,吾二位封桩,以待用度。然此未敢悬便,伏取千四朝奉尊兄长裁旨。某拜复。

又,至元二十二年分佃人坐欠未交之谷,请通侄带庄干六七前去催取,仍逐时将取到数目见示。其钞并桩管在通侄名下,以待此去公私用度,此系月淑弟立说。如此,极是,极是!又,应干庄内事务,出入往来,凡支费须是有名色,当支则可,然亦不可借此多支。如无名色当支而妄支者,庄内断断不认此费。又,无故自相与买酒炙共享之者,庄内尤分毫不认。同年月日,某再稟。^③

在第一份《复柬》中,金贵乙点名道姓地指责,每年义庄佃户欠租之所以会弄成一笔糊涂账,是因为在金贵二、元三两位掌事这一环节出了问题,这两人占着掌事位置却不干实事。提出,拟请侄儿金通孙主抓佃户欠租一事,督促义庄庄仆催讨佃户欠租,无论收回多少,都由他和金月淑两位提纲封存起来,以待日后开支。但他说自己不敢便宜行事,最终还得请族长、义庄事务管理最后决策人金资裁夺。从《复柬》中可知,在下东金氏义庄管理中,有一个庄仆群体,他们在催讨佃户欠租等方面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紧接着,在同日的第二份《复柬》中,金贵乙围绕催讨欠租、经费开支等提出了指令性意见:其一,至元二十二年的义庄佃户欠租,由侄儿金通孙带领庄干六七人前去催讨,并随时将催讨结果向金贵乙本人报告。因催讨欠租而划拨的专款置于金通孙名下,由其负责保管,以便支付催讨过程中的一切公私费用开支。其二,经办义庄内的一切事务以及出入往来,凡是需要开支费用的,必须要有正当名目,不得借机多支。无端

①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再上尊长柬》。

② 从往来信函中可以判断,此人当为下东金氏第6世金通孙。又,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卷3《事略》云:“处士通,事迹阙。”

③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复柬》。

胡乱开支费用,义庄内绝不认账。其三,没有正当理由、无故相互吃请的费用,义庄内更是绝不认账。从该《复柬》中可知,在下东金氏义庄管理中,存在着一个庄干群体,他们在催讨佃户欠租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限于资料,此处庄干与前述庄仆二者有何差异,在义庄管理过程中如何分工,尚不明确。

在至元二十二年年终下东金氏族内相关当事人围绕优化义庄管理运作展开的多次信函商讨的基础上,最终催生出了下一年年年初的《丙戌年新立规约》。该《规约》也是目前所见宋元时期下东金氏订立的最后一份义庄管理规约,具体内容如下:

一、众共看兑,当来千四朝奉批云:若以行一十二人并往佃家,费其饮饌,必致亏租。仍依上年分东、西二仓掌管,每边六人。今则思之,若分为东、西仓,恐仍有弊倖。自丙戌年为头,随有工夫能事者,只作三五日内并行看兑。其除放合到提纲宅,当面除放,书写佃状,并定数目,上簿分晓。如有私与佃人通同,以多为少,瞒昧入己,提纲不测,前去核实,如有弊倖,公共屏黜。其除放亦不许一人独自擅权,定要参之众论,方与批放。

一、掌事之责,径依千四朝奉尊旨,不必亲自履亩。或有私约,坚要挽前私去看兑,生事撈扰,在提纲亦断断不准,众位亦合申举,公共屏黜。

一、教口斤头,除族中依送依前来旧规外,并行均分。其每年羨余,随多寡均分,提纲二员、掌事二员、管年九员外,余者并不在均分之列。

一、田信鸡,提纲二员、掌事二员,提纲人各六只、掌事人各五只外,管年九员,自行均分。其酒钱并与管年,以为裹足之助,提纲、掌事不在沾分。俟取足日,于酒钱内合拨些小,为提纲、掌事一杯之奉。

一、提纲、掌事支请,依旧规外,各员添支谷十秤。

一、下仓交谷点心,自丙戌年为头,人各馒头一双、酒一杯,随多寡人员上帐。如有别行过支,庄内并行不认。

一、兑支钞物,应干用度,合依近来规约,计月依例还息。若管年人内有本力者,通众充兑支遣,连押簿籍,附兑支人照会。其帐目定就月终结算,请掌事批注,提纲签过为凭。候收成日,先拨还兑支本息及输纳官赋了毕,然后方行依送。

一、凡在义庄人员及管年等,并不许到佃名下私自收取分文谷钞。如有此等之人,定行公共榜示,并行阁支,永不许管干庄内事务。

一、自丙戌年为头,只行春季标挂之礼,其秋季标挂,年来时艰事阻,且行寝免。

一、每年族中有当行礼典,不可缺失。最是贺正之礼,久已亏废,今已自丙戌年为头,团拜于都尊长宅,岁终亦合行分岁礼,以聚团栾之会,庶尊卑名分愈久愈明,式副义庄标名之美号也。

所立条目如前,永为定规,毋更纷更,各宜体悉。

至元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具^①。

该《规约》共计10条款。第1条主要讲看兑、除放等义庄具体管理事项问题。指出,族众、管年共同看兑,原来族长金资批示,要求分为东、西仓轮流掌管,现在看来,在实践中仍存在舞弊。从至元二十三年开始,挑选有闲暇时间、能任事的人,以三五日为限,一同前往并完成看兑。至于除放一事,应当到提纲家中,当面除放,书写承佃文约,确定减免租谷数字,登记入簿。看兑过程中,如有管年私下与佃户串通勾结、中饱私囊等营私舞弊行为,提纲察觉、核实后,公同将管年罢黜。除放租谷,不许一人擅权独断,须参考众意,方可实施减免。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壬午年续置规条》第4、5条款中的相关内容的修正与再次重申。

^① 正德《新安休宁文昌金氏世谱》附录《丙戌年新立规约》。

第2条主要讲“掌事”的管理职责问题。指出,依照族长金资的意见,掌事不必亲往田间地头去实地督察。如果掌事抢在管年之前私自前去现场看兑,无端生事干扰,众位管年应当申诉检举,公同将掌事罢黜。此处所谓掌事“不必亲自履亩”的规定,早在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金贵乙给管年金佛孙等人的回函中即已提出:“贵二弟、元三侄两位,仍着掌事之劳,但不必亲去履亩,庶有体统。”这一条,主要是对上述规定的重申,并就此类事情提出应对办法,属于对此前相关内容的补充完善。此条再次提及,在提纲之上,还有族长金资扮演管理顾问和重大事务决策人的角色。

第3条主要讲敖口斤头等物品的分配问题。指出,敖口斤头,除了依照旧规在族中散发赠送外,剩余部分实行均分。对剩余部分的均分,随其多寡,在提纲、掌事、管年中进行,其他人员则被排除在外。从此条可知,当时下东金氏义庄具体管理者的组成结构是提纲2人、掌事2人、管年9人。

第4条主要讲田信鸡、酒钱的分配问题。在租谷之外,佃户还要缴纳田信鸡、酒钱等钱物,是徽州地方较为常见的一种附加剥削。如元代,休宁陪郭程氏规定:“每年租谷、田信鸡并系当首之家收贮,于内先支纳官税粮,余者收贮,不可另用。”^①

第5条主要讲提纲、掌事支请义庄仓谷问题。指出,提纲、掌事申请支取义庄仓谷,除了依照旧规外,每人可以多支取仓谷十秤。表明,在义庄仓谷申请支取方面,提纲、掌事等义庄管理者享有一定的利益。

第6条主要讲佃户下仓交谷的点心提供问题。指出,佃户将租谷上交入仓时,其点心由义庄提供,随人员多少入账。如有超支花费,义庄内一概不认。

第7条主要讲兑支钞物取息问题。指出,从义庄借支钱钞和租谷等一切费用开支,必须依照近来制订的相关规约执行,按惯例以月为结算周期收取利息。如果管年人中有一定资本和实力的,族众向其借支钞物,必须画押签字登入簿籍,并附上借支人相关借支书证。每月终结算账目,经请掌事批阅并签署意见,报提纲签字作为最终凭据。等到收成之日,先拨还借支本息及输纳官赋,此后方可交谷入仓。

第8条主要讲义庄管理者和具体事务人员不得私自收取佃户谷钞问题。指出,义庄管理人员不得私自到佃户名下收取谷钞,如有此类情形,一定要张榜公布,并暂停其从义庄支取钞物资格,永远不许其管理庄内事务。从此条可以看出,除了提纲、掌事、管年等义庄管理者外,还有一批“义庄人员”即具体事务人员,前述庄干、庄仆应在其中。

第9条主要讲墓祭祖先问题。指出,由于时处宋元易代之际,时局艰难、经济困难,从至元二十三年开始,只举行春季墓祭祖先仪式,停止秋季墓祭活动。

第10条主要讲举行典礼问题。指出,族中元旦贺岁团拜之礼久已停废,现已于至元二十三年元旦当天恢复,族人于族长家中举行了团拜礼。年终也应当举行分岁礼,使族人得以团聚、尊卑名分得以彰明,这样才可与义庄之美名相称。

由上可见,《丙戌年新立规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该《规约》是对3年多前订立的《壬午年续置规条》诸多相关内容的修订完善与重申。其二,与《壬午年续置规条》相类似的是,该《规约》依然聚焦于义庄管理层面,对义庄管理顾问族长,义庄事务管理者提纲、掌事、管年,以及义庄具体事务人员着墨更多,对上述人员的权责规定更为细致。其三,与《壬午年续置规条》不同的是,该《规约》对恢复举行贺正之礼、分岁礼等族中典礼予以特别重视,强调在赈济等物质手段之外,用礼的手段团聚族人,维系宗族伦理和秩序。这是宋元易代后该族对旧有传统与秩序的某种向往与回归的反映。

结 语

义庄自北宋范仲淹开其端,因其具有赈济族人、保障宗族社会稳定的现实功用而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效仿设立。现有文献记载表明,受范仲淹创设义庄以济族的感召,宋元时期徽州宗族族人曾有

^① 弘治《休宁陪郭程氏本宗谱》附录《休宁陪郭程氏贍莹首末》,明弘治十年刻本。

诸多设立义庄的实践。就徽州境内义庄设置主体而言,宋代主要为官僚士大夫,入元后,主要为庶民。除了前述南宋休宁下东人金文刚、金大镛,休宁旌城人汪泳,休宁东阁人许文蔚有设置义庄之举外,管见所及,徽州境内设立义庄的还有以下数例:(1)南宋,休宁闵口人毕景镇,“以儒起家,仕闽长汀令,绍兴间谢政闲居。有三庄在休宁,曰高枧、曰隔山、曰闵口。每岁春以督耕,秋以稽获。值休岁饥,乃发庄廩,赈济三庄附近居民,全活甚众。久外欲归,而三庄士民暨闵川父老遮道请留,乃于闵口庄西数百弓,芟草莱、辟基址,鳩工筑室,不日成之,遂携家而居焉,是为闵川之始祖也。”^①此处,休宁毕氏宗族在县域内高枧、隔山、闵口三地设有3座田庄,这些田庄虽未直接明说就是义庄,但从其在饥荒年份发挥赈济功能,赈济对象为田庄所在地乡族社会中饱受饥荒困扰之人来看,应即是义庄。(2)宋末元初,婺源庆源人詹公昌,“置孝义庄以赙给贫者”^②。此处,义庄赈济对象虽未确指,无疑应是乡族贫困之人。(3)元代,婺源官源人汪奉先,“创置义庄,以恤乡里贫乏”^③。此处,义庄赈济对象为乡族贫困之人。(4)元至正十一年(1351),黟县黄村人黄真元,“念祖宗先泽不忍没,效范公法买田六百三十余亩,立庄建祠,祀其先人。自始祖而下,冢木蓊郁,祭膳糴芻。族众百余口,日食岁帛、婚嫁丧祭,给支有等。”^④该族义庄规模较大,其收入主要用于祭祀祖先、婚丧嫁娶、族人生活补助等方面。(5)元末明初,休宁率口程氏商人程维宗(1332—1413),“增置休歙田产四千余亩,佃仆三百七十余家,有庄五所:其曰宅积庄,则供伏腊;曰高远庄,则输二税。其洋湖名曰知报庄,以备军役之用,至今犹遵守焉。其藏干名曰嘉礼庄,以备婚嫁。其杭坑名曰尚义庄,以备凶年。其各庄什器仓廩、石坦垣墉,无不制度适宜。”^⑤此处,经商获得暴利的程维宗所设5庄,其中“尚义庄,以备凶年”可以明确是义庄外,其他4庄,从发挥赈济、资助等功能看,也内含有关宗族义庄的性质。揆诸宋代徽州科举和仕宦日益发达的历史事实,上述列举的义庄事例,理应只是宋元时期徽州宗族义庄实践的一个缩影和侧面。

就目前所知,宋元时期徽州宗族义庄实践中能够留下像休宁下东金氏这样义庄管理与运作内容较为丰富,义庄规约制订时间连续、条目清晰、内容翔实的事例并不多见。休宁下东金氏宗族义庄实践表明:宋元时期特别是南宋,因应宗族内部贫富分化严重、贫困族人日增的客观形势,出于道义和收族的考量,身为宗族上层人士和宗族领导者的徽州官僚士大夫主动捐出俸赐设立宗族义庄,这些宗族义庄从倡议设置到具体践行并发挥实际作用,有时往往需要经历兄弟、父子以及后裔子孙等数代人的不断接续努力。设立宗族义庄,是富于忧患意识的徽州官僚士大夫运用物质手段济贫赡族、整合宗族的一种务实举措和责任体现。

宋元时期,休宁下东金氏义庄管理实行“提纲—掌事—管年”自上而下的科层式管理方式,在提纲之上有族长扮演义庄管理顾问和重大事务决策人的角色。这一时期,下东金氏义庄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义庄规约的制订与不断修订。南宋,下东金氏官僚金文刚制订了义庄规约,此后该族又将原先纸质文本的义庄规约刻在木板上并张挂于族中显著位置,形成了《义庄板榜规约》。到了元初,下东金氏因应形势变化,与时俱进修订推出了《壬午年续置规条》《丙戌年新立规约》。上述一系列义庄规约在确保宗族义庄管理与运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宗族义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确定性而更富有针对性和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义庄规约是族规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和类型。通过对时间上传承不辍、内容上日益丰富的休宁下东金氏义庄规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管窥宋元时期徽州乃至江南地区宗族义庄管理与运作的实态。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4卷《毕》,第667页。

②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名族志》前卷《詹》,第283—284页。

③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名族志》前卷《汪》,第222页。

④ 嘉庆《黟县志》卷7《人物志·尚义》;道光《徽州府志》卷12之5《人物志·义行二》。

⑤ 明《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卷3,明刻本。